

CONG WENXUE ZIJUE DAO WENHUA ZIJUE
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

潘年英 著 民族出版社

013039616

10
162

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

潘年英 著



10
162



北航

C1647256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 / 潘年英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105-12608-8

I. ①从… II. ①潘…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人类
学—文集 IV. ① I0-53 ② 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2577 号

责任编辑 宝贵敏

装帧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5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105-12608-8/I · 2400 (汉 2678)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北航

C1647256

见证“思考”（代序）

焦兰周

1

当下的文学创作备受批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可以作为标识性症候的有：拒绝面对大多数人的真实的生存状况，远离真切的社会现实，放弃“承担”的勇气。其实这是每一个文学时代都会遭遇的境况和“事实”。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作家都勇敢承担作精神战士，毕竟作战士是痛苦的，并且还要做出牺牲。要求每个作家作文学战士或斗士未免苛刻，实际上也不现实，其实做文学绅士也未尝不可。我们认为衡量文学的标准之一有“承担”，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有所“承担”的文学未必是好的文学，好的文学也未必一定真的有所“承担”。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学是要有所“承担”的，但如果让文学真的有所“承担”，往往更多的时候，它什么也“承担”不了。这是事实，虽然未免让人沮丧。因为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它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夸大文学对现实的影响是不切合实际或事实的幻想。如果真的想直接“改变”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做文学家，应该去做政治家好了。其实，真正应该对现实“负责”并做出“承担”是政治家的职责而不是文学家的职责。文学不等同于政治，政治也不会和文学划上等号。所以说“承担”固然很重要，但文学的本质并不一定是“承担”。特立独行的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孤独的文学战士固然令我们肃然起敬，但我们恰恰忘了他最重要、最高贵的品质之一是“思

考”，并不一定就是“承担”。我们再也不能因为强调“战斗”性而拒绝文学的多样性。文学的终极本质在更多的时候往往是“思考”。

其实，今天之所以令我们失望，并造成文学混乱、迷惘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作家拒绝思考。面对痛苦、悲惨的现实，作家是可以“承担”的，但不能也很难“改变”现实，因为作家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当然，“改变”现实也不是作家的直接职责。“承担”并不是也并不意味着要去迅速“改变”。然而现实的境况是，大多数作家只是乐意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或沉溺于事物的表象，不敢戳穿外在的一切，因为真相或真理太沉重了，并且这样做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还要付出代价。所以更多的作家采取回避的姿态，不敢面对历史、当下、未来、他人、自己等一切的现实。在政治化的时代，为了安全，他要媚俗。在商业化的时代，为了生活，他还要媚俗。但拒绝思考甚至“聪明”地沉溺于事物的表象刻意或者故意回避真相、模糊真相却是我们要批判的。在今天，作家的“思考”变成了空话、假话，甚至成了笑话。当然，我们并不企求每个作家都去“战斗”，但是再提“思考”——这一文学理念，对于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周作人曾言：中国过去没有问题小说，只有“教训小说”。“五四”文学革命后才有问题小说。问题小说与“教训小说”不同，“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①我们也认为，“教训小说”其实质不是“思考”现实，而是粉饰甚至掩饰现实，更谈不上反抗现实。它刻意迎合、维护统治阶级，没有多少进步意义，完全不同于“问题小

^① 周作人：《中国小说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第七号，1912年2月。

说”。周作人所说的“问题小说”的“研究”其实是借“问题”来“思考”现实，揭露现实，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这不但是“问题小说”的主导特征也是文学的灵魂和追求。

“求人解决的”道出文学的局限性，同时，也告诉我们文学的目的、表达方式是“思考”和揭露现实，不是当然也不能直接“改变”现实。“改变”现实并不是文学的首要职责和目标。当然，在实际上文学也“改变”不了现实，如果想改变就要“求人”，不是仅仅“求己”就能完成的。周作人又言：“问题小说所倡导的，必是未成立的，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周作人指出了文学创作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和魄力，对未来要有所规划，把“思考”的目标指向对未来的关注和建设。他还言：“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指出文学要向下看，“思考”和关注的对象应该是平民、大众。

“问题小说”引领了一个文学时代，它的目的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它的精髓是“思考”，然而，却受到了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指责。严格意义上讲，文学家和文学是开不出什么“药方”的，也无法直接去“疗救”，因为这些不属于作家而属于政治家的职业范畴。周作人对“问题小说”的论述所勾勒出来的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仍符合今天的某些文学现实。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思考”——这一优秀的文学品质却被抛弃了。当然，当今文坛上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家在“思考”，他们的努力还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鼓励的。年轻的侗族作家潘年英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我有限而肤浅的阅读范围内，他可以说是一位执著于“思考”的作家。特别是在我读完他的小说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

潘年英的小说《金花》展示了他执首努力追求的一面——“思考”。他把“思考”和探寻的目光聚焦于当下他们的精神实质。

《金花》写了一个女人金花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犹豫和摇摆，但在“物质”强大的进逼下，她步步后退，放弃了“精神”而俯就于“物质”，终于全面溃退，彻底放弃了精神的底线。金花明明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张局长，但为了生存，还是屈服于他，最后甚至还莫名其妙地依恋他。金花不但背叛了她自己，同时也背叛了感情和精神，她始终无法走出困惑的迷津，在忏悔的感情旋涡中不断地“背叛”。潘年英记录和见证了金花无可奈何的蜕变史，从而对当下中他们的精神实质作出了深刻的书写。更深一步地说，在灵与肉的框架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中，潘年英探索了当下中他们的精神状况：“灵”与“肉”的永远无法重合，“精神”和“物质”始终无法兼得。金花开始时是一个精神主义者，但在“物质”的逐步蚕食下，她开始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不断迟疑、摇摆，这表明她追寻的已经不再是“精神”了，而是“物质”。最终她无奈和悲痛地放弃了灵魂而选择了“物质”，放逐了“精神”，认同或者说是屈服于“物质”。但是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生活不值得一过。金花不断追逐和回忆童年与往昔，表面上是再次“重拾浪漫”，寻求“精神”的高贵和纯洁，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灵魂和精神已经不止一次被亵渎和玷污了。不论是精神出轨还是畸情，金花都是不情愿的，但她还是无法阻止自己而是迅速地下滑。可以说，她是在“物质”的逼迫下清醒地堕落。从“灵”到“肉”再到既非爱情、也非婚姻的畸情，表面上金花有所挣扎和反抗，实质则是无奈的屈服和妥协。这种畸情已经被撕去

了精神的外衣，“情”渐渐被“欲”所取代。金花从一个爱情主义者，到婚姻主义者，再到畸情主义者，一步一步地走向沉沦和堕落。这一个不幸而辛酸的事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对精神的背叛。从爱情神话到婚姻谎话，最后到畸情恋的笑话。金花的这一精神退却就是当下许多中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实质的一个缩影。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我们不想也不愿知道真相。不是我们不能“改变”现实，而是我们不想，不愿，不敢改变现实，甚至不敢面对和“思考”现实。我们一直被动地受制于甚至屈服于现实，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对于事实，我们不能再回避和躲闪，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在《金花》中，潘年英没有让文学“思考”的翅膀贴着生活的表象优雅地滑翔，也没有停留在虚幻的文学想象中，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事物的真相。他勇敢地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展示给我们事物的本质。他刺痛了我们在现实面前已经麻木的感觉神经，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灵魂。他曾经这样说：“我想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着，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现实，表达现实，反映现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作家，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对世界的看法。”^①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对世界的看法，但“思考现实，表达现实，反映现实”是我们作为作家的职责和义务，特别是“思考”更是我们作为作家的核心本质。这就是潘年英的文学理念和追求，他对现实的思考、表达、反映不但具有勇气而且也有相当的深度。

① 潘年英：《顿悟成篇》，257页，26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潘年英对他们的贫穷话语也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在《金花》中，金花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聪明好学，终于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然而命运不济又被迫回到家乡。在求学梦破灭后，金花的父亲试图摆脱贫穷话语折磨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断。他有过属于自己的憧憬和梦想，然而贫穷话语却使之不断地泡沫化。这不但磨损了他的精神，甚至彻底压垮了他自尊的脊梁。“但是，他却始终向往并念念不忘那似乎唾手可得的又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他也经常缅怀那一段短暂而美好的音乐人生。每次喝酒之后，他总是要大声地声讨自己的命运？……”贫穷话语改变了他的一生，甚至注定了他的命运多舛。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穷依然如此。学校各种收费太多太贵，且社会上物价上涨太快，“金花记得那时候父亲总是成天在抱怨社会不公，对未来的前途毫无信心。”现实社会并没有满足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最基本的物质幸福和快乐。相反，物质的贫穷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们，他们被迫进行无穷无尽地妥协和屈服，尊严不断地被凌辱和践踏。贫穷不但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而且制约和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提升，严重损害了公平和正义，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是滋生邪恶和苦难的温床。它摧毁了他们的理想和梦幻，禁锢和束缚了他们灵魂，压抑和腐蚀了他们的精神，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噩梦，并且贫穷是世袭的，是一副与生俱来的沉重枷锁，他们为此丧失了尊严与自由。这明显不符合并严重违背了现代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缺乏任何现代意义上的质素。当然，造成这一切的不仅仅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下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等各种因素。潘年英沉重而悲

愤地强化了贫穷话语对他们的折磨和蹂躏，批判并谴责了造成贫穷的政治话语和制度话语及文化话语。

小说开始时金花是一个自尊自爱的姑娘，而且聪明、漂亮、文静、高雅，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她的形象在我们面前慢慢坍塌。和父亲一样，她无法也无力超越政治话语和制度话语及文化话语造成的贫穷。她的勇气日趋消磨，在不公的现实境域中逐步走向沉沦和堕落，然而，她只能无奈地嘲笑、作践她自己。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是无奈地放弃。金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越过道德和精神的底线放弃灵魂和尊严，背叛了自己，背叛了爱情，背叛了理想和精神。金花的每一次背叛都意味着失去和退却，她不断地在迷失中迷失。金花从“灵”的高贵、纯洁的“神”被彻底祛魅为“欲望”的懦弱、龌龊、肮脏“动物”，高贵、浪漫被层层褪去，这意味着他们在贫穷话语的挤压下精神呈现出了全面失落。潘年英借助婚恋透视和考察了现代人的精神实质和生存困境，通过金花不断下滑的轨迹，揭示了贫穷话语对他们的伤害和侮辱。在全球化浪潮下，物质飞速发展，财富呈几何速度的积累，但他们仍然被贫穷话语所掌握，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仍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退步。

通过金花父女一老一少的奋斗历程，潘年英联结“当下”与“过去”，审视和思考了贫穷话语的冷酷与残忍。他告诉我们：从“过去”到“当下”，中国的物质文明其实根本就没有富裕过，中国实质上仍然是“传统”中国而非“现代”中国。我们的每一次抗争都意味着更多的失去和伤害。贫穷话语扼杀了“现代”的同时也封杀了“未来”。从它攻无不克的庞大力量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实际的境遇：我们仍旧生活在落后的

“过去”，而不是生活在文明的“当下”，更不是生活在别处，我们并没有拥有“当下”，我们仍是游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孤魂野鬼。时代在进步，世界在发展，财富在积累，然而贫穷并没有被消灭，仍是我们文明的常态。我们停留在“过去”，对于“当下”，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延伸而已，二者并没有质的区别，“未来”更谈不上。通过对贫穷话语的书写，潘年英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思考了他们艰难的生存境遇，更道出了现代人在“当下”和“过去”之间的纠结。我们只有“过去”，没有“当下”，那么我们有未来吗？我们未来究竟将走向何方呢？

潘年英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过去”和“当下”，而是把“思考”的触须伸向了未来。他毫不掩饰对贫穷话语的仇恨和愤怒，对现代人的未来表示了强烈的焦虑。可以说，金花的追求和背叛丧失了任何的进步意义，严格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反抗，而是一种退步。她已经迷失了目的和方向，褪去了任何进步的色彩。这难道是现代人所要追求和奋斗的结果吗？面对“过去”的重负和“传统”，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和策略呢？我们“背叛”的终极意义难道是进一步的放弃和堕落吗？实际的状况是我们“当下”的背叛和抗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甚至丧失了目的、指向。我们的精神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相反，是更加地沉沦，甚至有进一步沙漠化的可能。我们这群所谓的现代人依然活在“过去”，并且没有把握“当下”，当然“未来”更无从谈起。

潘年英曾言：“不瞒大家说，我是一个生活在农业时代的人，我的情感和思想依然停留在农业时代，我只对乡村、泥土、自然感兴趣，而对于城市，对于工业或后工业文明，我是很隔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确是太不与时俱进了，太落伍于这个时代了。我现在在学校教点书，但课很少，大多数时间里，我只

在乡间行走，所以网上有人说我是‘乡村骑士’，我比较喜欢这个评价，感觉名副其实。”在文本中潘年英淋漓尽致地对此作了诠释，这也是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独特理解：贫穷是我们的本质，我们仍生活在农业时代，我们的一切依然停留在农业时代。他根本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因此，潘年英只对乡村、泥土、自然感兴趣，自甘寂寞地作一个“乡村骑士”，“落伍”于这个“喧哗”的时代，对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伪命题或与之类似的时髦理论是不感兴趣的，当然并非是隔膜，而是绝对的不相信。

4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思考是一种勇气，其终极目的就是揭示事物的真相。在苦难和不幸的现实面前，作家不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更不应该低头、屈服和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作战士进行质疑和思考，进而决绝地对抗。鲁迅曾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的文学追求以自励。但正如鲁迅所言作战士是痛苦的，不但要直面惨淡的人生还要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不但“思考”而且还要勇敢地指证一切的丑恶并起诉这不合理的一切。当然，破坏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建设，在揭露的背后是大爱，是希望。为了更好的将来，他必须做到“我无远虑必有近忧”，始终保持一种思考状态和勇于面对的精神。鲁迅曾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①这不但显示了思考的“勇气”也显示了战斗的决心。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5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对于一切权威来讲，作家应该是一群难以驯服的精神动物，他必须拒绝对任何权势的谄媚，并且不去追逐任何的时髦理论，对现实的一切保持高度的警惕。他的思考精神和勇气注定他很难和现实达成和解与妥协。潘年英依然对当下的书写现实做出这样尖锐的批评：“中国作家普遍欠缺理想的人格塑造，大多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坚持原则，苟活心理很严重，这和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作家应该永远坚持以良知为准则的发言，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说假话，昧良心，拍马屁，想当官，这是中国作家和文人的通病，毫无人格可言。”

当下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文学更加刻意追求娱乐和轻松，拒绝痛苦、沉重，放弃甚至削平深度，作家更多的则是转向媚俗、迎合大众，甚至谄媚大众。他们乐意在个人的小我中流连忘返，或者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面对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不是沉默中爆发，而是在沉默中死亡。文坛充满了太多太多的炒作和喧闹。文学已经变得不再有危机感。在这种写作语境里，作为文学观念之一的“思考”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真相在更多的时候是令人不快和痛苦的，真理的声音也往往是刺耳的。因此造成了“思考”书写的大面积缺失。

张炜曾言“一个人的思想要参与历史和事件。像‘九一一’连带了多少大问题，它需要耗费我们的许多思想，它在等待我们的见解。如果自己没有见解，就要接受别人的见解，就要放弃思考的权利——世界上再没有比放弃思考的权利再窝囊的事情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① 在实际的写作生活

① 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2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中，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参与历史和事件，相反，我们是在回避，是在接受别人的见解，不但没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主动放弃思考的权利。“世界上再没有比放弃思考的权利再窝囊的事情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就是我们当下真实的书写现实。

思考也应该是一种先锋姿态和前瞻性的工作。思考的核心品质就是质疑和否定一切既定的观念、传统，高扬人的主体性，义无反顾地“揭露”和探索。变革和创新是它的动力源泉和追求目标。它不受制于任何已有的思想和规则的牵绊。它质疑历史、传统，批判当下，忧虑未来。它力求破译、解码事物的真理。它不是为了取悦人也不是为了指导人，更不是为了“教训”人，所以不一定要具有导师的姿态和傲气，更不是要盛气凌人地对现实的一切指指点点。只有缺乏深刻思考的写作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思故我在”，如果“思”一旦停止，“我”就不复存在，文学也就走向了死亡。“我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指责是没有道理，上帝笑的是“我们”，而不是“思考”，是“我们”有问题，而非“思考”有错。然而我们当下的文学恰恰缺乏这些可贵的品质，遭人非议也在所难免。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言：“小说家有三个基本的可能：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讲述”、“描写”应该是属于技术层面，追求的是故事的精彩和诱人，相对容易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易进入事物的核心。说的刻薄一点，其目的是为了吸引人取悦人，并且，实际上确实有一种媚态在里面。相对于“描写”和“讲述”，我更推崇“思考”，因为它要诉求的是真相或真理。

在政治强力介入的时代，为了安全，我们放弃了思考。现

在商业化的侵袭，为了生活，我们又拒绝思考。事实是我们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和欺骗自己，我们也未能很好地继承鲁迅的“上下求索”的思考精神。我们并不奢望用“思考”这一标准批评、要求所有作家。因为“思考”毕竟是沉重和痛苦的，并且，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实际上也不可能并且也不现实。这也是事实。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悲观，因为毕竟还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像潘年英一样的年轻的作家在思考和探索。

目 录

见证“思考”（代序）焦兰周 /1

第一单元 文学的民间视角 /1

- 一、“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管见 /3
- 二、“民间”的复兴 /11
- 三、大时代背景下的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 /24
- 四、汪曾祺与余光中的散文世界 /34

第二单元 文学人类学概念辨析 /45

- 一、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涵义辨析 /47
- 二、人类学文学写作的再思考 /56
- 三、文学如何“人类”？而且“学” /64
- 四、在边缘处求索 /78
- 五、破学科壁垒，跨文化阐释 /92

第三单元 新文化与新文学 /103

- 一、论侗族新文化与新文学 /105
- 二、在“原型”中寻找“民族性” /118
- 三、读稿人语 /124
- 四、真实的力量 /138
- 五、退守内心的写作 /144

第四单元 行走与写作 /153

- 一、写作理论三题 /155
- 二、与中学生谈写作 /165
- 三、从应试作文到自由作文 /171
- 四、让文学插上想象的翅膀 /187
- 五、行走与写作 /191

第五单元 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 /241

- 一、从文化自觉到文学自觉 /243
- 二、驳“张艺谋神话终结论” /253
- 三、文化自觉时代的新乡土建设 /282
- 四、再谈文化自觉与新乡土建设 /292
- 五、论职业大学的生存战略和发展战略 /311

第六单元 原生态文化研究 321

- 一、原生态文化保护中的主客关系论 /323
- 二、在自觉中保护，在保护中自觉 /333
- 三、论崇武旅游开发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336
- 四、行走于田野与文本的双重世界 /344

后记 /366